

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王 岩

【内容提要】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既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部署的有效举措，也是开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的重要目标。鉴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任务依旧艰巨的现实境况，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迫切需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致力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与发展内在机理方面的研究，着重从话语生产的巩固、话语内涵的丰富、话语表达的创新、话语传播的优化和话语体系的完善等视角出发，有针对性地探求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工作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作者简介：王岩（1964-），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 200240）。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对于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党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旦旁落或丧失，就必然会诱发政局动荡、政权易手、政体更迭乃至国体变更，犯无可挽回的颠覆性、历史性错误。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既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待解决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的现实问题，又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承担的“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现实任务^②。因此，为了切实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引领权和话语权，就必须切实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实针对性，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精神力量和思想动力。

一、巩固话语生产，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供给力

话语权作为一种权力关系，预示着任何一种话语生产都是对某种权力世界的凸显，且都映射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16ZZD0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一整套有着权力色彩的“复杂结构的话语”，其中源源不断的话语生产是维系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所在。为此，要着力巩固话语生产，在质和量上改善话语供给，以此来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供给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社会阶层逐步分化，以往那种传统封闭、整齐划一的社会逐渐被现代开放、多元分化的社会所替代；传统社会的那种一元化的道义观、义利观逐渐被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公民意识、功利原则以及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所取代，导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或同一阶层内部之间的异质性增强。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呈现出因理想信念淡化而产生的人生信仰迷茫，因工具理性张扬而导致的价值理性遮蔽，因价值取向多元而滋生的核心价值弱化。这一方面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内生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供给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信力不够。实际上，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存在样态而言，在不同的学科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缺失现象。有的学科本身拥有完整的话语体系，只是过于拘泥于理论的形式和历史的传统，致使在话语生产的过程中现实性和时代性不够，在实践中难以发挥理论的引领作用，出现声音弱化、底气不足的现象；有的学科的话语生产受到了来自西方话语体系的渗透和挑战，导致现实中的两套话语体系，甚至出现了前者对后者的“依附”状态，由此导致前者被“空心化”“边缘化”的问题；有的学科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没有系统、明确的话语体系，由此导致在话语生产中出现主流意识形态“碎片化”“散在化”“隐性化”的问题。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甚至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丧失。相较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4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稳定的话语系统，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抢占话语先机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囿于其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西方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期在话语权的争夺中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譬如，个别西方发达国家人为美化、拔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民主模式，并以推行所谓“普世价值”之名而行分化、西化中国之实。这就表明，无论是与国内社会主体多元价值选择的现实需求相比，还是同资本主义久远而兴盛的思想文化对照，或是和抵制西方“普世价值”传播的时代要求比较，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仍然显得不足甚至滞后。

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显然，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亦即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分配，有赖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生产者”进行调节。而所谓“思想的生产者”主要是指那些“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可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绝非一般性的话语重复，而是对代表阶级利益和阶级思想的话语的再生、再造，故而必须由知识化、专业化的理论队伍来完成。列宁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理应“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④。邓小平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可或缺性，他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1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3页。

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①这就告诉我们,广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承担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重任,始终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宣传和教育的最前列。包括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须臾离不开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文化素养高深、知识视野开阔、业务素质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打造这样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一方面,既要在宏观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扶持与实施力度,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员和组织者提供政策保障和服务平台;另一方面,还要在微观层面上加快任务落实,相关机构在人才培养、绩效考核、薪酬待遇、职位晋升、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方面要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殊性,制定出符合其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政策和办法,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应有的尊严和权利,真正提升他们的职业责任感、事业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唯有如此,才能铸就一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才能确保他们在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供给能力中守护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

诚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的支撑,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其“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②。这是理论工作者应该坚守的话语自觉和理论自信。这种自觉和自信必然要求我们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方面葆有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首先要“立足本来”,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中寻求根由,通过发掘、捕捉中华民族深厚的优秀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中国人民鲜活的生活实践,赋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其能够精准地反映出我国独特的历史传统、独到的文化积淀、独有的基本国情,以及独具的发展道路,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形式和叙事框架。这样的话语生产既照顾到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本质要求,因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需求和凝聚社会共识,提升人们捍卫精神文化自主性、社会制度独立性的能力。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够“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具备洞察世界局势、把握时代潮流的敏锐性。要知道,只有将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置于全球语境之中,才能在及时借鉴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适时了解和认知世界发展形势的过程中,不断提炼和打造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我们有理由坚信,通过“中国梦”“亚投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诠释与传播,新时代的中国不仅对内能够防范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而且对外能够提升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

二、丰富话语内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解释力

理论创新是意识形态话语力量的不竭源泉。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而言,它只有与现实发展、群众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拥有强大的话语力量。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其话语权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勇于直面复杂的矛盾,敢于进行伟大的斗争,在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实现理论创新,由此凸显马克思主义无穷的理论魅力和实践活力。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170 年时间里，正是在这种彻底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创新中形成强大的真理性力量，逐步成为影响和引领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性话语。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因此，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离不开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复杂社会矛盾的追问、批判与回应。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实现理论创新、丰富话语内涵，以此增强解释力的应然之径。

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内涵，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② 问题作为“时代的口号”，既构成了理论思维的起点，也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③ 这就表明，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对于理论创新和完善至关重要。当然，按其本性来说，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思辨的观念”或“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一种“发展着的理论”，肩负“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神圣使命，对其应用必须做到“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引申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④ 这既是理论适应实践发展的需求，也是理论本身自我革新完善的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自觉秉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善于根据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实际，在直面问题、解决矛盾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内涵，实现理论创新，进而确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所以，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性审视新时代中国前进征程上的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力结合时代变迁和实践发展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广度和深度上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内涵，从而增进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与情感认同。

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内涵，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观念既有着特定的社会内容，也有着特定的服务对象。在理想状态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切意识形态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对于任何一位意识形态理论的生产者、创作者而言，“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⑤。同理，对于任何一种作为价值观表达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说，“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⑥。脱离人民利益、背离人民意愿、游离人民生活的意识形态理论，终将“使自己出丑”且为人民所抛弃。归根结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既是书写历史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5-19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

“剧作者”，也是演绎历史的“剧中人”。在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口头上宣称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却在现实中时常沦为统治阶级压迫乃至奴役人民的工具。但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先导和行动指南，毫不隐瞒自己的人民立场和价值取向。就像《共产党宣言》所公开坦露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正是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异化处境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出发，通过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私有制的彻底消亡，借此达至每个人都能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毋庸置疑，为人民代言、为群众发声的朴素情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最鲜亮的政治底色和最厚重的价值底蕴。今天，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其前提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察民情、析民意、解民忧、聚民心、汇民力，自觉把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内涵同融入人民生活实践和满足人民利益诉求紧密联系起来。要知道，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历史命运的体察和同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根基所在。所以，我们要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内涵，从内容上论证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民生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切实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

三、创新话语表达，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

人类社会所有的思想成果（自然包括意识形态），既需要凭借语言进行表达和记录，也需要借助语言进行积淀和传承。语言作为人类意识反映现实的最重要的载体或手段，充分彰显了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因而成为连通思维与存在的桥梁。对于语言的产生，马克思曾解释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②在人类特有的思想意识世界里，语言既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是现实的直接思想；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只有与语言“联姻”，才能实现“于有声处听惊雷”的传播效果。而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是同人们的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对内推广与对外传播，都必须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才能够得以完成。概而言之，无论是零碎思想的表达，还是系统观念的叙说，都需要语言力量的支撑。正是在此意义上，语言天生具备承载与传递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天生与语言密切相关。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意识形态话语只是止步于内在抽象的思辨环节，而缺乏外在具体的语言表达，那么它势必会陷入“有理说不出、道不明、传不开”的话语困境，从而使意识形态话语权大打折扣。所以说，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力度。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在领导和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一方面，尤为关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严格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在语言上更加亲和、更加接近人民群众；另一方面，特别警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可能出现的“空泛化”“自由化”以及在语言上不讲政治原则、政治底线的言语作秀和作怪行为。

选择行之有效的话语表达方式，实现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变和创新，是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二法门。只有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方能够密切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才可以使之更广泛地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在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生存条件差异化的现实条件下,作为理论化、系统化价值观体系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层次性。故而意识形态教化在面向不同的受众群体时,需要运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现在开始着力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征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以“革命性、动员性”叙事为特点的话语表达方式逐渐与以“建设性、生活性”叙事为特点的话语表达方式趋同,并在趋同的过程中赋予前者以时代的内涵,赋予后者以崇高的意蕴,从而实现了两种话语表达方式的融合与统一,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性与严肃性。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体接收、分享和反馈信息资源的便捷性、交互性、海量性和及时性,客观上使得政治话语的方向性、学术话语的科学性、网络话语的开放性和生活话语的通俗性呈现融合的趋势,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搭建意识形态大众化的传播平台。然而,就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而言,尚存在着话语表达方式过于单调的问题,诸如官方话语多于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多于生活话语、理性话语多于感性话语、说教话语多于沟通话语等。这就必然要求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和表达上综合运用多种话语表达方式,突破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之间的隔阂,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变“单调生硬”为“丰富生动”、变“传统说教”为“时代表达”、变“说文解字”为“赏阅体验”、变“照本宣科”为“启发引导”,不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②,可见,在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过程中,最为紧要的就是赋予主流意识形态以现实化、人性化、个体化的语言形式和简洁明了、生动活泼、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通过借用为人民群众所熟知的生活化、网络化语言去析理明道,构建亲和力、时代感、学理性、鲜活性和大众化相融合的话语表达体系,以此使人民群众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提高理论兴趣、接受思想教育、增进价值认同。这种对话语表达生动性和艺术性的讲究,不仅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水平,而且还有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活力。

话语表达纵然是获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话语表达都能够代表意识形态的本义和真义。甚至有些时候,某一形式的话语表达严重扭曲、损害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要义。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而无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权威性、崇高性和严肃性,非但不能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反而会为非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提供可乘之机。长期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表达上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空泛化”倾向与“自由化”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来自“左”与右的干扰方面。其中,“左”的话语表达以“封闭僵化”的保守态度和教条式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左”的话语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阻塞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说途径,既有损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威信,也制约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功效。与“左”的话语表达相反,右的话语表达则打着“回归主流文明”“确立普世价值”的旗号诋毁、篡改马克思主义,要求用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思想理论界和媒体舆论场为例,主张用学术化的样态遮蔽或解构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杂音”“噪音”时有显现,这些话语或人为割裂改革开放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68页。

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或肆意贬抑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或过度美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或打着“再思考”“再认识”的旗号用“虚无主义”的手法“告别革命”、调侃经典、消解英雄、解构历史，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取向戏谑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而彻底取缔马克思主义。可见，无论“左”的还是右的话语表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的正确形式，都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此，我们必须要进行坚决抵制和彻底批判，自觉划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

四、优化话语传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辐射力

话语传播作为话语表达在程度和范围上的延伸，是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话语表达只是让意识形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管声音的大小、强弱，那么话语传播则能弥补话语表达中的不足和缺陷，促使声音传得更快、更广、更远，因而也更能深入人心。所以，单纯的话语表达并不能完全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认同，需经由广泛有效的话语传播才能实现。一言以蔽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和确立离不开话语传播。毛泽东认为，一切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单是“说什么”“如何说”的认识论问题，它还涵盖“如何做”“做什么”的实践论问题。他强调：“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①这里的“造成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所关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怎样开展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中伤和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感染力、影响力，就曾借助党内学习整风、党外学术争鸣、国际记者报道等多种方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在成功展现马克思主义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建构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与延安时期相比，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传播技术、传播媒介、传播团队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但面对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实力尚且薄弱，以至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时常受阻，而无法及时回应和澄清西方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误读、误解、误判。

诚然，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舆论主宰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实力并非一时之功，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也绝非易事。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②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利用这种思想体系和舆论话语的优势，相继炮制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怪论、谬论，横加指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一再证伪了西方舆论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尤其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越来越注重对外话语的传播，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渴望听到中国声音。而就整体传播实力来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上仍未彻底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其中缘由除了受西方强势舆论话语的影响外，还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软件”和“硬件”存在短板有关。“软件”短板表现在利用互联网思维不足，反映和处理事关意识形态重大原则的突发性问题时敏锐度不高、应变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8页。

能力不强，导致非主流意识形态抢占网络话语先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价值却被遮蔽。“硬件”短板则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能力欠佳，主要表现为线性传播有余网状传播不足、组织传播有余媒体传播不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输送渠道闭塞、辐射范围压缩，从而削弱了国内外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受度、认可度和信任度。

坦率地讲，在网络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的当下，优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任重道远，容不得有半刻犹豫、半点闪失、半步差池。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主体协作，形成传播合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媒体、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传播主体间的通力合作与相互配合。只有充分发挥多元传播主体的联动效应，才能在形成强大传播合力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信息的全面覆盖、全程覆盖和全员覆盖。二是明确受众特点，适应传播发展趋势。在互联网时代，各类社会信息的传播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受众已不再是被动的聆听者和接受者，而逐渐成长为有效信息的寻觅者、积极意义的阐释者、主流价值的建构者。因而，要明确话语传播的目标对象，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身心特点进行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调整，不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信息的精细化投放和精准化传播。三是革新媒体技术，拓展传播渠道。新媒体作为人们获取信息资讯的重要来源，现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关键载体。为此，要加大对新媒体技术的开发、投入、应用和监管力度，倚重并且利用新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声，通过占领舆论高地来破除人们对西方话语的迷思和幻想。在此基础上，还要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积极打造“点、线、面”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式”传播平台，着力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多向传递，进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面和辐射力。四是重视议题设置，增强传播动能。在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中，科学议题的设置既能够吸引国内民众按照拟定的规则或章程一致行动，也可以提高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顺势摆脱西方媒体涉华负面舆论的掣肘。所以，无论是揭示国内社会现实矛盾还是报道国际社会热点问题，相关媒体都不该绕弯、回避，而应立足于中国立场、全球视野，在精心策划和设置重要议题中引导世人客观公正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如近年来 APEC 北京会议、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大会议题的设置，就充分凸显了议题设置之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积极意义，既为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包容、创新、活力、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

五、完善话语体系，激发主流意识形态竞争力

话语权得以提升与巩固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话语体系的完善。纵观人类文明史，每一民族、每一文化、每一阶级、每一时代都有体现本民族特色、标识本文化特性、代表本阶级利益、符合本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作为知识文化和思想理论的载体，话语体系既蕴含着特定阶级组织、利益集团的思想立场和理论主张，又彰显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和未来发展走向，是滋生话语权的内生变量，也是维持话语权的重要保障。就此而言，话语体系构成了话语权的基础，离开话语体系支撑的话语权建设，无异于虚语高论而质非文是。需要言明的是，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生成与创立，起初并不是自发自在而是自觉自为的过程。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率先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话语体系，并成功地将非西方世界纳入其话语解释框架之下。

在当今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西方话语体系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具有的内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充当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马前卒”。面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代表两种社会制度的话语体系面临着此消彼长的状态。即如列宁所说，“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①。于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肩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迎难而上、砥砺前行，以无可辩驳的发展成就为繁荣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翔实的素材和丰富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也由此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仍存在着一定的“唯西是从”“唯洋是举”的现象，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曾一度沦为西方话语蚕食的重灾区。有些人甘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们奉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认为只有以西方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理论、逻辑、方法为准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才最为“前沿”、最具“权威”，才能被国际社会承认。此种错误认识恰恰是导致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被边缘化、空心化、标签化、碎片化和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直接缘由。“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②这就表明，尽管我们已经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问题，却又难以回避失语挨骂的尴尬现实。倘若我们只是一味地推崇、依附西方话语体系，只是简单地套用西方制度模式和治理方式来观察世界、解读中国，势必会陷入西方国家所设置的话语陷阱而丧失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本质上来说，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话语体系与我国的政权性质和党的执政宗旨有着根本矛盾，我们既不能以此来分析中国问题，更不能以此来指导中国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美民主化进程受阻，就是前车之鉴。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这套生发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基因上的话语体系，也已无力应对贫富分化加剧、价值共识缺失、阶层分裂严重等内政治理难题。西方话语体系的频频失灵，在导致资产阶级政府和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同时，也诱发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信任危机。为了化解和消除西方话语体系所带来和造成的思想混乱与发展风险，应当坚定话语自信，着力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此作为加强与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石。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立足中国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三个面向”，在关照历史、回应现实、展望未来的基础上不断激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竞争力。其一，不忘本来，面向历史，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崇高的精神信仰和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华夏儿女在世界文化风云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所在，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秦诸子学说至宋明程朱理学，中华文明所孕育的“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民胞物与”的仁爱观、“义利有别”的道德观、“内圣外王”的修身观、“讲信修睦”的处世观等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人类社会发 展难题的重要智慧，因而富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唯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并从中汲取智慧，

①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才能在熔铸和传播中国价值理念中焕发出生机活力。其二，吸收外来，面向现实，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遵循开放性原则。“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这就告诉我们，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决不能囿于一隅、自说自话，而是要强化与世界话语体系的彼此对接和相互交流，善于以人类的情怀、世界的眼光批判性地学习、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敢于将西方先进的文化理论、思想方法有鉴别地拿来为我所用，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其三，面向未来，勇于担当人类社会发展使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旨在创造出引领性概念和原发性观点，使之能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切实转化为话语优势、舆论优势，进而为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贡献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理念。理论与现实反复证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也并非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单一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各国对现代化模式的探寻和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其中最有感召力、说服力的一点，它集聚着共商共建共享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话语力量，也理应有充实人类文明新内涵、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拓展人类文明新道路的话语自信。

总之，新时代就要有新作为新气象。准确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还是话语权的较量，“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本质上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②。这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机理，通过巩固话语生产、丰富话语内涵、创新话语表达、优化话语传播和完善话语体系，不断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6]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编辑：黄华德）

①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

② 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